

暗地开花：冀鲁豫根据地 困难时期中共对伪军的争取

翁有为 李金晖

内容提要 盘踞在冀鲁豫根据地周边的大批伪军,是根据地生存发展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到了根据地最困难时期,伪军数量成倍增加,对根据地进行包围封锁和步步蚕食,根据地形势日趋严峻。为挽救危局,中共适时转变斗争策略,对伪军进行争取、瓦解。通过研究中共对伪军工作的整体情况并剖析中共争取两个伪军大队的个案可发现:中共与伪军建立“关系”相对容易,而要长时间地维系这种关系和更深一步地掌握伪军则要复杂和曲折得多;与此同时,中共还要应对日军对“与我关系密切之伪军”整军肃内的威胁和国民党对伪军这一力量的争夺。史实表明:中共通过开展对敌伪军工作,掌握了部分伪军,扭转了敌我斗争态势;对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这部分伪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战略性力量。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冀鲁豫根据地 伪军 敌伪军工作

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475001

李金晖,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475001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中共在敌后对伪军展开争取、瓦解工作的研究并不多见;相关研究多是从宏观上进行方针、政策和原因等方面的论述,停留在表面,缺乏历史的鲜活展现,对个案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敌工作中的诸多关键、具体的问题仍显得扑朔迷离,如:中共对伪军的争取掌握一般经历了怎样的步骤?从一开始与伪军建立联系到后来切实掌握伪军经历了怎样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与伪军建立关系之后是怎样维系这种关系和局面的?国共双方对伪军这一势力的争夺进行了怎样的博弈?对这些问题学界还没有很好的回答^[1]。基于此,本文以“中共对两个伪军大队的

本文受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国家治理研究创新团队项目(2019CXTD003)支持。

[1]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对伪军争取瓦解问题的相关专题研究并不多见。柳丽葳的《中国共产党争取伪军工作论述——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河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晋察冀根据地对伪军的争取工作进行了总体论述,但缺乏中共对伪军争取的过程的描述。刘金旺的《抗战时期华北伪军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整体上对中共对伪军的工作和国共对伪军的争取工作有所涉及,但缺乏细节的鲜活展现。刘志鹏的《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对国民党对伪军的争取工作有所涉及。针对冀鲁豫根据地的专门研究和以伪军大队为个案的微观研究还没有见到。

争取”为研究个案^[1],以小见大,试图通过分析大量中共敌工会议总结、敌伪军工作报告等档案资料和其他资料,回答中共是如何一步步争取、掌握伪军这一重要问题。历史的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多种势力交织下中共在敌后面临的复杂的战争环境和出色的敌伪军工作背后的艰难。

一、争取敌伪工作的开展:由建立“关系”到转为“自己人”

争取伪军工作,一直是中共在华北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做的重要工作。重视战场以外其他战线的配合作用,有利于转变敌我斗争态势,能够更好地维持在敌后的生存。敌工战线是其中的一条重要战线。诚如陈毅所言:“在抗日战争中,敌伪军工作是有其特殊重要意义的。由于中日战争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直到现在日本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如果不从内部去分化他、瓦解他,削弱他的力量,而要完全用自己比较劣势的军事力量去压倒敌人,真正要达到反攻胜利是不可能的。敌伪军工作是策动敌人打倒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只有敌人自己打倒自己,才能最后打倒敌人。”^[2]毛泽东也曾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3]

早在1939年,中共就认识到了敌军工作的重要性,初步明确了敌伪军工作的战略目标和主要工作方式,要将敌伪军工作提高到战略的地位,争取敌伪军对我同情^[4],派人打入伪军内部,建立抗日的堡垒^[5],“敌军政治工作的重心,当以争取和瓦解伪军为重要任务,而这是敌人力量最薄弱和呈现动摇性最大的地方”^[6]。但是,由于此一时期中共忙于开辟根据地以及根据地的各项建政工作,对这一工作的注意一般说是不够的,是各项政治工作最薄弱一环^[7]。直到1941至1942年,日军逐渐发现中共的武装力量是其在华北最主要对手,连续五次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共进行“治安肃正讨伐”。在敌残酷的“扫荡”和进攻下,我根据地军民虽英勇战斗,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态势,我党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期间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根据地缩小了,“解放区人口已由一亿降低为五千万,八路军也由四十万人左右减少到三十万人,干部也损失了很多”^[8]。日军扩大了占领区,战线必然拉长,兵力就愈显不足。中共发现“敌人兵力愈不足愈分散,愈加紧组织和利用伪军,现在各地伪军都有显著的增加趋势”^[9]。面对伪军军力的动态变化,中共有意识地从各方面强化伪军工作,强调动摇伪军,促使伪军从内部分化,在某些已经不能巩固,且受日寇摧残的地区,对伪军伪组织应普遍进行交朋友工作,少结仇怨。从长期斗争着眼,少受一分摧残,即多保留一分元气^[10]。具体的工作方式是“各战略地区内及周围有主要作用的地方性伪军,特别省县警备队保安队等由各区域负责进行工作”,要做到“打入人员潜伏掌握之”“建立关系订立某种协定”“争取其帮助抗日”“利用机会发动反正”^[11],甚至做到“每个据

[1]为行文方便,笔者将这两个伪军大队名为I、II伪军大队。文中××某,A、B、C、D中队等符号,档案原文即是如此。

[2]陈毅:《敌伪军工作的意义及其任务——在盐阜区敌工会议上的报告》,新四军敌工部编《敌工通报》(第三期)1942年7月27日。

[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4][5]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四册,抗日战争时期(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51页,第672页。

[6]刘型:《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1939年10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第十期。

[7][9]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五册,抗日战争时期(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第39页。

[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10][11]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第3页。

点有工作和一个工作干部掌握每(一)个据点”^[1]。毛泽东也曾对平原抗战做出重要指示,“在这些地区(三角地带)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军伪组织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荫蔽的方式”^[2]。由此开始,中共华北各根据地注重建立健全组织严密的敌工部门,加紧培养训练有经验的专门人员和干部,开启了敌伪军工作的新阶段。

从1942年一直到抗战胜利,是中共敌伪军工作的大发展时期。《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加强争取伪军工作,使敌人变生腋下,措手不及。”^[3]以冀鲁豫根据地为例,1942年前后,日伪军对冀鲁豫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贯彻“囚笼政策”,采取逐渐蚕食、“铁壁围剿”的办法向根据地展开全面进攻^[4]。在日伪军的进攻形势下,“根据地缩小七分之三,原有人口350万,现只剩下200万”^[5]，“部分地方武装叛变投敌,部分群众遭受敌人摧残,部分党政工作受到损失”^[6]，根据地进入空前艰苦时期。基于空前严峻的客观形势,单纯的军事力量已不足以扭转恶劣的斗争形势。在这一时期,中共适时调整斗争策略,把敌伪军工作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正如陈毅所说,“在这个时期我们说敌伪军工作应提高到首要的地位,人人都要做这一工作,这是对的。……敌伪军工作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7]。为应对严峻的斗争环境,中共加强了对敌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

在激烈的战争对峙中,中共发现日军本身存在着深刻的不可弥补的缺点,那就是兵力不足。“日军所占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8]。如冀鲁豫根据地周边的日军总兵力为六千左右,要想对冀鲁豫如此广大的平原乡村实行有效统治就不得不大量扩充伪军。“日军占据的地方不过是‘点和线’的‘骨头架’,特务机关指导中国军、官、民扩大治安地区,要给骨头贴上肉”^[9]。日军在扩大治安区,给“骨头贴上肉”的过程中,积极扶植伪军、伪政权,一方面是弥补自身兵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妄图削弱中国民众的抵抗情绪,以达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华北地区的伪军都大量增加,如冀鲁豫区周边的伪军从1941年的三万多人,据点298个^[10],增加到1942年的八万余人,据点639个,再到1943年底的十万人左右,据点899个^[11]。伪军在日军的行动中充当着重要角色,配合日军对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不仅如此,随着伪军实力的增强,其有时甚至能单独行动,独当一面,不依靠日军,就能主动进行“剿共作战”。冀鲁豫地区的伪军“在无敌人配合或很少配合条件下,犹能突出向大块地区进攻与‘蚕食’”^[12]。在这种形势下,日伪军在根据地周边建立起成百上千个据点,对根据地进行严密控制,层层封锁,严重威胁到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到了1943年,战局发生了对中共有利的变化:由于日军太平洋战场形势的恶化,部分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为增强机动,加强外圈控制,日军将战略上的次要地区、大量据点交由伪军守备。日伪分驻,在整合集中日军兵力的同时也放松了对伪军的控制。中共分析认为,国际形势使敌人更加困难,伪军伪组织更加动摇^[13]。伪军工作要由“宣传阶段真

[1][2]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66页,第234页。

[3]《加强争取伪军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

[4][5][6][10][12][13]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453页,第250页,第205页,第179页,第330页,第205页。

[7]陈毅:《敌伪军工作的意义及其任务——在盐阜区敌工会议上的报告》,新四军敌工部编《敌工通报》(第三期)1942年7月27日,第2页。

[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107页。

[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11]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2页。

正进入组织阶段,由一般找关系的阶段进入组织上真正掌握一些伪军伪组织的阶段”^[1]。中共明确提出要“确实掌握”伪军伪组织的战略目标。

中共在对伪军的调查中发现,日寇和伪军之间,伪军内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真正效劳于日寇的只是少数死心塌地的大汉奸,许多分子都是被拉去被强迫下来干的。……那些被迫分子,他们一方面慎重,一方面感到生命无保障,栗栗自危”^[2]。“区县警备队受敌压迫最厉害,……敌控制最严,其队长常受日军打骂。……内部封建集团多,外来派和地方派矛盾大。……外地人多东北人,伪县长一来,带来好多自己人,排挤了本地人”^[3]。一些大股伪军的头目说,“对敌人就是胡弄他而办自己的事”,“见了鬼子既提心吊胆又愤恨填胸”;“敬鬼神而远之”是他们对日军的普遍心态,“保存实力,以待将来”则是多数伪军投敌的真实目的^[4]。这些都是日伪之间存在着深刻民族隔阂与成见的真实写照。因此,中共判断:“在敌伪间潜在着深刻的矛盾,……有时只要我们加以利用就闹得不可收拾。只要我们在工作中贯穿‘发现矛盾,扩大、掌握、使用矛盾’的方针,争取伪军以至反正是完全可能的。”^[5]

在争取之前,首先要发动政治攻势,“政治攻势,就是于武装斗争配合之下,从政治上去进攻敌人,在敌人统治内部去建立反对敌人的‘第二条战线’,挑动与扩大敌伪内部的矛盾,促进敌人统治机构的腐烂、瓦解与动摇,助长敌人军队的反战厌战情绪以破坏其顽强性,从组织上去争取、控制与掌握伪军伪组织的人员,使其同情抗日与秘密帮助抗日,团结敌占区一切中国人,争取人心向我”^[6]。

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意义在于“攻敌之心”,“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坚持敌后,熬过时间,从各方面隐蔽地去积蓄力量,……从敌伪内部去积蓄力量,也正是我们积蓄力量的一个方面”^[7],我们必须用政治力量,冲破敌之封锁,打入敌人内部,攻敌之心^[8]。日军也对中共的“政治攻势”有所察觉,“中共的政治攻势,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逐渐活跃起来,采取使新政权两面化的政策。对武装部队进行抗日赤化工作,目的在与加强‘利用新政权充实抗战力量’的程度,使新政权在平常执行政务时形成抗战的外围力量,使新政权的部队成为‘反攻友军’”^[9]。中共在自身军事力量不足以战胜敌人的情况下,只有发挥政治上的优势,才能弥补不足,完成攻守之势的转换。

政治攻势的主要手段是展开猛烈的宣传战,“印发宣传材料,通过一切关系(个人的、敌工的、社会关系等)把宣传品、小册子、传单漫画,有组织地输送到敌占区和敌据点去,并检查其反映情形。将日侨招待券、觉联参加志愿书、抗日同情证有组织地发放到对象手中”^[10]。广泛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发动伪军与敌不合作、明合作暗不合作,利用一切办法挑拨敌伪矛盾,争取一面派为两面派^[11]。扩大宣传实际效果,还进行伪属档案的登记,召开伪属座谈会,通过伪属人员对伪军进行宣传和情感联络工作^[12]。经过整月的对伪军、伪组织的有计划宣传,伪军知道了“一年打败德国,两年打败日本”,使敌人知道了我俘虏政策,转化了敌伪,不象过去那样尖锐对立,仇视,“一般的有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念”^[13]。“甚至有些伪军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找日本人借钱交统一累进税”^[14]。中共武装斗争与政治攻势相辅相成密切结合的斗争方式,显示出极大效果,如“敌人强迫(伪军)放火时,焚烧草堆以支应敌人。在某地通过敌人封锁线,遇伪军只以手比作‘八字’形,即畅行无阻”^[15]。中共总结道:

[1][6][7][8][14][15]罗瑞卿:《今年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在北局党校上课提纲》,《前线》(第33期)1943年3月15日。

[2]苏振华:《开辟敌占区工作初步总结》,〔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14-01389-003。

[3][10][11][12][13]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页,第295页,第391页,第668页,第363、559页。

[4][5]《山东分局、军区政治部关于大股伪军工作经验的初步整理》,《战士》(大股伪军工作特刊)1945年4月。

[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页。

“有了政治攻势的配合，就能打许多巧妙的仗，使我们花代价少而胜利大。这是与我们‘熬时间’克服困难的总方针相适应的。目前敌后环境艰巨，战斗频繁，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军队本身要更多地执行政治攻势的任务，要善于使每一个军事行动，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善于使每个军事行动，得到政治攻势的保证，如最近冀察晋，他们举行了一个对敌政治攻势突击周，全区有组织有计划地采用逮捕和动员等办法，将伪组织人员五千余名弄到根据地受训和参观，使敌占区顿呈混乱状态，人心惶惶，‘群龙无首’，收到了很大的效果。”^[1]

中共疾风骤雨的政治宣传，使伪军内部部分人员开始动摇，与中共建立起各种零星的关系。零星关系的建立，“还只限于一般下层工作，而且基础尚极不巩固，从战略观点来看，还不能起着决定作用”^[2]。为求得伪军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转变过去那些只做下层工作、不敢接近上层的倾向。要从党内抽调一部分有社会经验、有社会联系的高级别干部去打开伪军伪组织上层工作的局面^[3]。“如果我们一方面能把下层伪军伪组织工作做好，又能掌握几股较大的伪军伪组织中中上层分子，在抗战形势发生大转变时，在战略上会发生极大的作用”^[4]。

中共中央敏锐地观察到“对伪军工作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加强争取伪军各级军官，事实证明，伪军军官是可以争取的，其效力也很大”^[5]。中共往往是“采用了先打开其上层关系，取得上层关系对我的信任，撤除了下层伪军对我接近的顾忌”，从而大量发展关系^[6]。要想打开伪军上层关系，首先要经过周密详细地调查，对某一伪军部队，必须力求历史的全面的了解。在三分区对 I 伪军建制大队的掌握工作中，就先对该大队进行调查，了解到该大队系地方实力派伪军，下属三个中队，共计 400 人，中上层干部多为我军叛徒，大队长及 2 名中队、1 名书记、1 名小队长皆为白区时党员，后跟随该大队长脱离革命而投敌。该大队长 X 某系该县南区人，叛变前曾为该县县委书记。X 某虽对我军有怀恨，但对革命是始终留恋的，加之在白区时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多在三分区担任要职，又引起他无限欣羡与忏悔，他的防地又在我小块根据地包围之中^[7]。这种中上层与中共多有历史渊源，反共立场不十分坚定，且军事力量弱，处在包围之下的孤立伪军，是中共理想的选择争取对象。

其次，要打通关系。该大队的中上层多系中共叛徒，中共对根据地这些人的心理和现实出路有准确的分析：“叛徒一般政治上苦闷，感到无前途，无出路，叛变后见敌黑暗太多，反悔。……总之，叛徒是可以争取回头的，与叛徒绝对对立……是错误的，……研究每个叛徒叛变的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在争取过程中，必须进行适当的批评，否则，他们不相信我们是真的，但批评又不要过分，予留出路，回头是岸。给予一定的任务，不然他认为党不相信他。党是否还相信他，在他是个大问题。”^[8]在打通关系时，初次见面联络的人选十分重要，在隔膜颇深的情况下，联络人的举止、言谈与气度都是伪军初识中共对其态度的重要依据。在接触中既不能表示我与对方是同等地位，又不能盛气凌人给人家一个生硬的印象，态度既要和蔼谦虚又不能“低首下心”“吹牛拍马”^[9]。总之，一切都要随机应变，拿捏好分寸。中共先派宣传部部长王同志与 I 伪军大队长进行联络，由于王同志言语较刻薄，批评过

[1]罗瑞卿：《今年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在北局党校上课提纲》，《前线》（第33期）1943年3月15日。

[2][4][8]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页，第560页，第362页。

[3][6]《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

[5]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7]《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1。

[9]《山东分局、军区政治部关于大股伪军工作经验的初步整理》，《战士》（大股伪军工作特刊）1945年4月。

度,加之他做过锄奸工作,对该大队长刺激很大,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后,中共更换人员,由某支队司令与之接头。该司令是与该大队长在白区长期共同工作的老同志,又在军中担任要职。由有较高地位的干部进行工作,使该大队长产生信任,感到有保证,与中共建立起了联系^[1]。

打通上层关系后,中共对该伪军的影响力仍然有限,要想进一步扩大影响,就要深入下层工作,与伪军士兵广泛建立联系。中共在工作中认识到“过去只认为‘兵随将转’,但未想到‘将’不转时又该怎么办?”^[2],要注意下层工作,“上层是重要的,是基本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下层又往往起着决定作用”^[3]。实践证明,下层基础做好,也能够“控制”上层,因此中共认识到“在进行争取伪军工作时,应把争取上层与争取下层兼施并顾,才能收到速效”^[4]。要实行广泛的打入工作,通过上层以组织下层,掌握下层以控制上层^[5]。因此,要把对上中层军官工作和下层士兵工作结合起来,上层关系的打通,是对下层进行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合法掩护,有时甚至可以让下层有意知道上层,可促其有勇气与我接近^[6]。由于伪军内部封建色彩浓厚,迷信、盲从长官的习惯很深,下面轻举妄动会有杀身之危险。往往我方与其上层一来往,下面也敢于逐渐倾向于我;先争取一个上层分子,下层即可跟随他走^[7]。由于上层被争取,下层与中共接近也就消除了顾虑,中共在伪军下层中大量发展关系也就顺理成章。

从上到下大量关系的建立,与“保证任何情况下听我指导与指挥”^[8]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因此,必须对关系人进行艰苦而细致的“教育提高”工作,使他们由“替敌服务到应付敌人,暗中抗日”,由“一般的两面派”转变为“革命的两面派”^[9]。首先,中共对关系人“提出口头保证,或给以抗日同情证,表示我相信他不是死心汉奸,以鼓励他为我工作。对于表现好、工作多、忠实于我们的关系,发给公民保证书,保证其战后可享公民权”^[10]。中共以此掌握关系人,使他们不肯放弃既得的政治权益而积极工作。而后,中共给予关系人一定的可能完成的重要任务,使他感到被信任。“因伪军上层多是权谋之辈,疑心重。因此,在关系发展一定程度时,为解决他们的疑惧心理,我应表示对他大胆相信。1943年春,我冀南军区刘主任负伤,交给该大队长掩护休养,并附设电台一架。将如此高级干部交给他掩护、对他这种大胆相信,使他感觉到受宠若惊。在半年的休养中,刘主任以及来看望刘主任的宋政委、陈司令等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该大队长完全断绝了与国民党的关系,大部分坦白出了与敌国特的关系,参加三青团的经过,向党表示了坦白,更加依靠我们。”^[11]

这样,精心挑选相熟的高级干部出面与该伪军上层进行接头并给出承诺保证,详细介绍时局、党的伪军政策和对叛徒政策,向其指明出路,促使其转变;建立关系取得一定信任后,必要时给予其一定的可能完成的重要任务,注意对其进行不间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步步细致入微的工作成功消除关系人的疑惧心理,增加了他们对中共的信任与依赖,中共在该伪军中的影响力随之进一步提升。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日臻成熟,中共需要将确实掌握伪军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在伪军中进行组织工作,建立抗日性的组织和党的组织,将分散的关系人联合起来,形成一支坚强的力量。中共中央曾做过全盘部署,“地方性的伪军(如伪县警备队、自卫团等)应为军分区敌伪军工作的主要对象,普遍进

[1][11]《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1。

[2][3][6]《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2。

[4]《八路军第120师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经验》(1942年5月),总政治部编印《政工资料》第一期。

[5][8][9][10]《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

[7]《山东分局、军区政治部关于大股伪军工作经验的初步整理》,《战士》(大股伪军工作特刊)1945年4月。

行交友与接头,建立关系,逐步做到打进其内部取得部署与工作,以便在组织上掌握之”^[1]。“关于伪军伪政权中我党组织问题,应以短小精干长期隐蔽为原则”^[2]。中共派人打入伪军内部,主要通过四种方式:①通过伪军一定关系人之允许,合法打入;②大量物色培养俘虏之伪军官,经过一定教育争取打入;③通过地方党的组织细胞,有计划的物色训练党员打入;④整理过去失掉关系之党员,消极动摇了的党员,给予安慰,恢复一定之关系(特别党员或候补党员)打入^[3]。打入人员自身要具备以下四项人格品质才能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①要忠实坚定,党性强,真正做到“出于污泥而不染”;②要勇敢不怕牺牲,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③要机警灵活,善于化敌为友;④要吃苦耐劳,有远见,有高度的革命忍耐力^[4]。孤悬敌后、身处重围的敌工人员不仅自身时刻有性命之忧,而且还要极力争取将关系人拉入抗日性的组织和党的组织以便掌握,自然需要特别的勇气和智慧。当然,一旦形成了对敌工作的氛围,情况就有了转换。关系人加入组织需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形来启发,如对农民出身的下层关系人,从其身边日常小事及生活等问题谈起,针对其本身的迫切要求,提出他的出路。对知识青年则抓住其进取心、热情等特点,说明他的前途及在我军工作的知识分子被重视等。对土匪则根据其崇拜英雄、势利眼的特点,多宣传我军事上的胜利^[5]。抓住每个阶层不同的个性特点来仔细甄别启发。当关系人有意参加组织时,要抓住其迫切心情,进行对组织认识的教育。有时还可以故意考验他,以考察他的决心,使他对参加组织出于至诚^[6]。这时的组织,还是指中共在敌伪中建立的外围性抗日组织,还不是中共这一核心组织。在参加组织前,关系人还要提出申请和进行庄重的仪式^[7]。事实表明,关系人参加组织必须水到渠成,经过必要的环节与考验后,才能达到争取工作的实际效果。通过争取工作,冀鲁豫区在伪军中组织了许多不同名称的抗日性组织,如三分区的杀敌复仇同盟、五分区的杀敌反正先锋队、七分区的抗日小组,以及其他分区的抗日青年团等^[8]。

关系人参加组织,便于中共交代任务和统一领导,同时组织的形成也是对关系人更深一步“教育提高”的过程,使关系人对中共更加亲近与信赖,“有的关系加入组织后不仅把自己看作一个关系,而(且)很得意的以为自己是暗八路了,认为自己是八路的一个成员”^[9]。参加组织,对关系人自身的行为和思想产生重大转变。有的关系人看到外线党员何等艰苦奋斗,他生活腐化、敲诈钱财的行为使他有愧于心。有的过去贪污的也不贪污了,好打骂老百姓的也不打骂老百姓了,自动去团结人,培养力量以备将来应用。五分区关系加入杀敌反正先锋队后,再见我干部时即较前大为亲密,工作也较以前积极,更好地告诉我们伪军中的秘密^[10]。在伪军中广泛建立抗日性的组织,还不能保证确实掌握该伪军。因此还要在伪军中开展建党工作,建立起党的组织。这标志着“对关系改培的成功。关系逐渐提高为党员,就会完全依靠我们。……认为是一家人了”^[11],也标志着对该伪军的“确掌”。党员的发展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从抗日组织成员中发展,在发展前按不同对象进行启发。如“对青年知识分子即进行共产党远大目的,及党的艰苦卓绝斗争事迹(的宣传),对出身贫苦的农民,即从其被压迫受痛苦来进行启发其阶级觉悟,然后在他自身要求之下予以发展”^[12]。另一种方法是寻找过去失掉联系而未有叛党作恶之事迹的党员,吸收他重新入党。“对于这种对象的发展首先要打破他悲观失望认为

[1][2]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66页,第308页。

[3][5]《山东分局、军区政治部关于大股伪军工作经验的初步整理》,《战士》(大股伪军工作特刊)1945年4月。

[4]陈毅:《敌伪军工作的意义及其任务——在盐阜区敌工会议上的报告》,新四军敌工部编《敌工通报》(第三期)1942年9月1日,第1页。

[6][7][8][10][11][12]《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

[9]《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1。

自己是无可挽回的观念,提出党对他的惋惜,允许立功赎罪,使他有信心重新振作起来为革命工作。再则揭发他怀疑党,是利用他的错误认识使他安心。在发展党上同样进行了庄重的仪式,入党后继续加强党的教育……”^[1]对曾经叛党的 I 伪军大队长等关系人重新吸收入党则属于第三种情况。以该大队长为核心,我敌工人员采取“内线开花”的方针来开展党的工作。因该大队长早已被中共争取,先后加入抗日性组织和党的组织,因此,由他来自上而下发展党员则相对容易得多,选择发展的对象多为中共蜕化分子,与中共有历史渊源者,灰色同盟的积极分子及有正义感、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现该大队已建立一个支部,共计党员 20 名,计大队长 1 人,中队长 1 人,小队长 3 人,分所长 1 人,书记先生 5 人,班长 5 人,士兵 4 人,支委 4 人”,并建立起会议、汇报制度,“大队长照顾全盘,现该大队之主要行政工作,皆掌握在党员之手”^[2],中共对该部伪军达到了确实掌握。

综上,中共对伪军的争取掌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步步深入的工作方法。首先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以广泛宣传来激发伪军的民族意识,与有所动摇的伪军建立起零星的关系。而后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确定争取对象,突出重点,通过争取伪军军官打开伪军上层,再由上而下发展起大量关系。大量关系建立之后,进行长时间艰苦深入的教育提高工作,增强其对中共的信任与依赖。待到时机成熟时,在伪军内部建立抗日性组织和党的组织。通过这一系列工作,逐步从满足于获得情报、物资便利的初级阶段,发展到深入掌握伪军,使之随时准备里应外合、杀敌反正的高级阶段,成功将部分伪军从“拉关系”发展为“自己人”。据统计,冀鲁豫区确实掌握的伪军伪组织有“伪正规军:建制营 3,连 11,排 11。伪警备队:建制大队 4,中队 29,小队 22,班 23,共计 5529 人。此外尚有伪县公署 2,区公署 18,警察所 15”^[3]。与中共建立关系的伪军伪组织更为普遍,如“五分局×城伪军五百,关系即占二百”^[4]。中共经过对伪军的争取、掌握与改造,扭转了“敌进我退”下根据地危急的局面,实现了“敌进我进”战略的目标,在敌人的“眼皮子下”隐蔽发展力量,以“外线配合”的方式坚持了根据地生存的斗争,达到了中共在敌后“熬过时间,来战胜敌人,保存自己”^[5]的目的。

二、内外线配合维持局面

中共与伪军建立关系相对容易,而要长时间维持住这种关系和争取对中共有利的局势则要复杂和曲折得多。根据地周边日军、伪军、国民党军等势力犬牙交错,斗争局面错综复杂。当被争取的伪军与中共建立秘密关系后,就会逐渐表现出对根据地“进攻性”的减弱,甚至双方完全相安无事。这就不能不引起日军的怀疑,日军通过情报调查后不难发现:“中共特别着重于削弱中国方面的机关,采取拉拢、瓦解等手段,不断进行地下活动。”^[6]他们了解到“中共对伪军的工作,以‘新政权’(‘新政权’即伪政权,下皆同,不复一一注明——引者)的治安军、警备队为主要对象,对之进行瓦解或争取,其基本方针是:如保留其原来立场有利,即不使之投降,而以之作为抗日力量留在敌人内部;倘已暴露不投降将有被消灭的危险时,应断然使之投降。与上层军官交往亲密,针对武装队所发生的怀疑、不满和动摇的情况,巧妙地煽动宣传。……原则上以政治争取为主,与‘新政权’武装队交涉谈判,对有密切

[1][4]《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 G0007-007-00045。

[2]《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 G0007-007-00045-001。

[3]《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 G0007-007-00045-002。

[5]罗瑞卿:《今年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在北局党校上课提纲》,《前线》(第33期)1943年3月15日。

[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关系的武装队,在军事上退让一步”^[1]。他们知道中共“对‘新政权’武装部队及官员停止过去那种称之为‘汉奸’和谩骂的作法,……实行怀柔政策,称之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其目的是先使他们中立,然后转向反日抗日,以期在中共总反攻时发动‘内应暴动’,从内部攻击日军”^[2]。在日军看来,中共的反攻绝不是以军事为重点,“而是采用政治谋略进行工作,以离间瓦解敌对政权和民众,到一定时期,使之从我方阵营内部起义,从外部则以中共兵力响应,以期采用中国自古以来的里应外合战术”^[3]。应该说,日军对中共的伪军工作从方法到目的都分析得相当精到。感受到了威胁,日军便加强对伪军的监督和控制。日军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对伪军“严格监视其抗日动向和防止其腐化堕落。并且要时刻防备和肃清民众及武装团体的不稳倾向”^[4],以“粉碎中共对‘新政权’的策动利用,加强对武装部队的清洗工作”^[5],“要加强对‘新政权’的监督指导,肃清敌性部门,加强薄弱环节,防止通敌叛变”^[6]。中共也发现,敌寇加强了其对伪军的控制力量^[7],“在敌占区实行残酷的‘清剿’,肃清内部等”^[8],“对伪军伪组织统治极严,特务横行,动辄以‘通匪’罪名加以枪杀缴械”^[9]。整体上看,日军对“某些‘比较可靠’的伪军,加以集中训练,由日籍教官、顾问掌握指挥大权;对某些‘可疑’的伪军,则强迫改编,调离乡土;对某些‘不听调遣’的伪军,则包围缴械,枪杀活埋”^[10]。面对日军对伪军压迫的加剧和严厉的“肃政肃军”政策,怎样保存自身,隐蔽发展抗日力量是中共和被争取伪军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以冀鲁豫根据地 I、II 伪军大队为例,可以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中共在具体应对日军进攻、破坏和清洗时的复杂历史场景。冀鲁豫根据地的伪军工作,存在联系过多、掌握伪军操之过急的现象,这是引起“关系”伪军被日军怀疑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早有指示,“应注意吸收军官入党,但每部只宜有三五党员,切忌庞大,而党员亦不宜过严格组织生活(如支部小组会等),以免破坏”^[11]。但冀鲁豫根据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实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

如 I 伪军大队被争取后,“我×县长与×××(大队长)又是老友、老同志,故大小事情都经过内线配合,甚至部队的每日移动都互通消息。情况稍为一紧张,×县长即到该大队所在据点内隐蔽,××住宅内几乎不到十天就平均有我干(部)前去,并一住几天。而我×支队×司令、×县长与×××私交深厚,又为当地一般人士所尽人皆知”^[12]。在伪军内部发展党员时,“一个中队已有 15 个党员了,还嫌不够,9 个班长已有 7 个党员了,还嫌少”,不知道规模大了、人数多了容易暴露目标^[13]。当对伪工作开展顺利时,忘记了隐蔽,如“开党员训练班,党的活动公开或半公开化,主要伪军曾亲自参加党的领导,进行民主坦白,设文化教员,提倡生产节约,种菜,打毛线,推磨,做群众工作,等等,八路军的一套工作方法方式都搬来了。在伪军中公开开会、唱歌、谈‘抗战’、‘八路’等等”^[14]。这种做法很容易暴露身份。特别是关系人自身也不注重保密,就更容易使日军注意到目标,如“我部侦察人员、工作人员经常到据点的集上赶集了,没有不知道伪军和八路军是‘自己人’的。……在他们出发时也曾公开不准打八路军”^[15]。在冀南地区,“××同志过铁路时,白天里在车站附近要伪军关系把封锁沟挖坏,让他的牲

[1][2][3][4][5][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 页,第 30 页,第 191 页,第 391 页,第 395 页,第 394 页。

[7][10]《加强争取伪军工作》,《解放日报》1942 年 6 月 9 日。

[8][9]罗瑞卿:《今年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在北局党校上课提纲》,《前线》(第 33 期)1943 年 3 月 15 日。

[11]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6 页。

[12]《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 年 6 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 G0007-007-00045-001。

[13][14][15]《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 年 6 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 G0007-007-00045-002。

口过去,结果以后被敌发觉,遭受摧残”^[1]。把本来应该隐蔽的关系公开暴露出来,等于告诉日军关系人本应隐蔽的特殊身份,自然留下惨痛的教训。

II 伪军大队活动在日伪统治下的敌占区,该部队人员齐整,武器齐全,为伪军主力。“A、B、C、D原为国民党军某部之连排长,该部北去后则投入张×所组织的县警备队。张×任大队副,A、B、C、D任中队长,中上层都是联帖仁兄弟,江湖义气相互关系密切,均为本地人,家在根据地或接敌区,有相当财产,能为我控制。部队成分较纯洁,多为本地良民被征集来,士兵对我无仇恨无恶感。了解我之一般政策主张,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薄弱,地方思想很强。”^[2]随着抗战整体形势的好转和根据地的扩大,中共部队直接威胁到A队的驻防地,A派其部下主动找中共联系。中共通过A间接与张某和B、C、D建立起了联系。建立起关系之后,中共直接派人与张某等谈判,要求他们“①不主动出扰根据地,不得已时只枪朝天放。②不捕捉抗日人员,照顾群众情绪。③供给情报,不使该地区部队受损失。④有隙可乘则共同参加抗战。如能履行以上事约则给他们以下保证:①保证张某某等目前与战后生命财产之安全。②保证张某某等战后享有公民权。③必要拔据点时事先商议绝不偷打。④反正后不缴枪不编散,帮助发展”^[3]。关系建立后,该伪军对日军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供给中共各种情报,掩护我公开和秘密抗日活动,并配合我合法斗争撤退××据点^[4]。这种长时间的和平共居,不可避免地引起情报网络发达的日军特务分子的注意。

由此,伪军内线遭到日军的严重怀疑,日军便对有嫌疑伪军进行“肃军清内”:整编伪军,以集合讲话名义将伪军缴枪编散,将少数人编入其他中队,其余遣散回家。因I大队与中共联系过密,引起了日军怀疑,日军先派某副官,对内线大队长进行思想侦察。该副官列举古今中外的文学家,测试大队长的态度,如问:“周作人你的明白?他的哥哥鲁迅你的明白?”^[5]而后就公开说他通八路,并有国民党思想,强迫他进城,否则解除其武装。日军还会派遣心腹人员进入据点监视该伪军,如日军派遣人员进入II大队A中队任小队长^[6]。这对与中共有关系之伪军造成极大恐慌。

中共为保存与之关系密切伪军的实力,隐蔽发展力量,会直接领导伪军进行“反清内”斗争,内外线配合来巩固该伪军的地位。“(伪军伪组织)只要与我们保持某种的联系,给予我们某些帮助也好。为此我们采取两面态度,并拉他们共同商量欺骗敌人的办法,这样是容许的。”^[7]甚至“在重要地区,为达到改善双方关系的目的,宁让伪军占领,不可引起日寇注意”^[8]。在对待和管理关系人上,要“为其着想,关怀他们的处境困难,不应作无理要求,体贴他们的两面地位,了解帮助我们对于敌人是不合法的”^[9]。为降低日军对伪军的怀疑,在斗争策略上要主动灵活,“把党的政治方针的原则性与一定情况下的必要的灵活性相结合,必须将上级的决定,指示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不能机械地去执行”^[10]。为更好地欺骗日军,掩护关系伪军,维持局面,中共会将两面派伪军的“革命性”一面缩小到很小的地步,“有时可以允许替敌人做点事情,只要没大的妨害;但不能因此故意做坏事,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允做,就在做的时候,也要少做。如抢粮,非做不可时,可预先通知我军中途夺回,或使群众不受

[1][9][10]罗瑞卿:《今年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在北局党校上课提纲》,《前线》(第33期)1943年3月15日。

[2][3][4][6]《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2。

[5]《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1。

[7]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五册,抗日战争时期(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

[8]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66页。

损失”^[1]。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来恢复日军对关系伪军的信任,使其敷衍敌人而实则革命工作。

为应对日军的怀疑和破坏,Ⅰ、Ⅱ伪军大队也变换策略,渡过危机关口。

在其内线方面,拔除内部钉子,如上文所说的日军心腹某某到Ⅰ大队担任小队长,在伪军内部就提出反对“一块坏肉满锅腥”,中共也在其据点周围“上夜课”,指出他如何坏。这种内部整体性对立情况给其造成很大压力,“×小队长在内外压力下只好辞职不干,以后敌人就没有再派人进去”。Ⅰ伪军大队长为应对日军让其进城,就“装病不进城”,并联络与其情况相似的伪军首领,“加约皆坚决不进城”,还通过“贿赂活动求得稳定自己的地位”。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进城,但不过夜,外面并作准备”^[2]。Ⅱ伪军大队在其内部由关系人出面进行统一思想,动员下层工作,表示:“鬼子想整编警备队,如果整编我们就和他干,到那不是吃饭呢?”^[3]在军事行动上,宣扬积极出扰我根据地,“内线可主动出发‘扫荡’几次,扫几个村子,大肆声言,造成该地区表面逆转的局面”^[4]。与此同时,外线中共军队隐蔽活动,紧密配合内线行动,欺骗日军。中共“假打散布烟雾弹,抓住××向我进攻的情形展开政治攻势”^[5],“对各据点展开了政治攻势并组织了几次假打,借以麻痹敌人”^[6]。

内线伪军关系经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斗争,再加上外线中共部队有力的配合,成功地迷惑了日军,巩固了其在敌方的地位。由于“敌人已认为把我抗日县府驱逐出境,故对×××(Ⅰ伪军大队长)的怀疑暂时降低,局面又暂时缓和下来”^[7]。日军鉴于兵力有限,在达不到对伪军绝对控制的同时,要依靠伪军来维持局面。因此,当某些伪军做出诸如“反正”等过激行动时,日军为使局面不失控,也常常会做出无奈的选择。如“由于邻县部队清内,伪军一个大队反正,敌人为了避免震荡过大,故又采取了缓和办法”^[8]。“自从5个中队被整编,引起了各地极大恐慌,(日军)又见了各部已有准备,于是暂停整编计划”^[9]。这样,中共经过不间断的“反清内”斗争,不仅把隐蔽的抗日力量成功保存下来,维持住了有利局势,而且使关系人对中共的信任和好感进一步提升。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关系人感觉中共处处为他打算,“帮助他应付了敌人整编,感觉到八路军‘够朋友’、靠得住”^[10],因而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更加靠近中共。

整体上看,1940年以后,华北日军逐渐认识到中共势力才是“治安肃正工作最强硬的敌人,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是华北建设的致命之敌。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11]。在争取伪军和争取民众的问题上,抗击异族入侵的中共有着日军无法拥有的先天优势。日军发现“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12]。尽管日军在战争相持期间就知晓了中共的战略方法和战略意图,但是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斗争形势千变万化的战争状态中,要想找出其内部深处潜藏的中共军事力量,想要侦破存在于异民族内部的秘密组织,可以说是难上加难^[13]。这也正体现出中共的高明之处,在军事上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中共善于发挥自身的先天优势,扬长避短,“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14],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15],通过“组织、宣传、争取打入”等工

[1]罗瑞卿:《今年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在北局党校上课提纲》,《前线》(第33期)1943年3月15日。

[2][4][7][8]《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1。

[3][5][6][9][10]《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2。

[11][12][13][14][1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2页,第191页,第477页,第473页,第472页。

作将日军势力下的大批伪军争取为抗日的外围军,甚至自身力量的一部分。在敌强我弱、极度艰难危险的战争环境中,中共这种化敌为友、化敌为我的斗争策略,使根据地得以顽强生存,并不断发展。

三、三方关系中的角力

抗战期间,冀鲁豫根据地周边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伪军这一军事力量,是国共双方都不能忽视的存在。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争取掌握伪军武装已成为“国、我尖锐的政治斗争”^[1]。

抗战后期,国民党集团从蒋介石到某些国民政府官员都开始重视这一现实问题。已有学者指出,“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国共之争凸显,蒋介石不得不根据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对‘军事汉奸’(伪军)的政策以拉拢和利用为主,借此来削弱中共势力”^[2]。蒋介石曾多次发布手谕强调研究对伪军的争取反正工作^[3]。国民党还派遣特务潜赴华北各地“收容敌伪,加以优容以开伪军反正自新之门”^[4]。

面对此种变化,中共敏锐地发现,国民党正以大力掌握华北伪军,这不仅表现在国民党为抗战孤立日寇,还有另一方面的阴谋就是今天掌握伪军伪组织利用敌人的合法形式打击与削弱我党、我军的力量,在反攻阶段到来时,掌握伪军反正,给以合法名义,巩固华北各大城市,以逼迫我仍处于乡村^[5]。中共分析指出,国民党特务在敌后极力争取对伪军伪组织的控制,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反共。不仅为了今日反共而且为了将来反共。他们在伪军伪组织中大肆宣传“共产党先甜后苦”,破坏我之政治威信,在给予伪军、伪组织的任命状中明白载上“坚决反共,不准与八路军接头”。到处宣传“华北无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心向彼。对我在伪军、伪组织中之关系实行恐怖手段,甚至借敌之手实行“借刀杀人”。我华北各地伪军、伪组织工作,过去所建立的摧残不少,就是国特各种陷害手段所造成,给我们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以极大障碍。不仅如此,他们还“坐镇敌占区,面向根据地”。过去国特勾结寇寇,甚至以敌人面目出现,破坏我根据地的事实在华北各地是屡见不鲜的^[6]。

国民党重视对伪军工作,有其自己的一套理路。其具体的做法,是利用伪军的正统思想,利用伪军士兵升官发财的心理,到处派干部打入伪组织。他们在伪军内部进行扭曲的反共宣传,说:“八路军现在抗日,群众致遭日本摧残,我们则是将来抗日的,故不招敌来摧残群众。”^[7]根据中共根据地的调查,掌握到国民党“一面对根据地积极进行特务活动,同时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工作。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原因,他们在伪军伪组织及敌占区上层分子中,是散布了相当的影响的。他们对我工作破坏的办法,主要是:甲、极力破坏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如我提出二年胜利时他们则提出:‘抗战两年会胜利,反攻要靠中央军’,‘胜利后国共还要打,我们住大城市,共产党钻山沟’,‘蒋委员长说:华北无汉

[1]《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2。

[2]马建标:《抗战前后蒋介石对“汉奸”问题的应对方略》,《晋阳学刊》,2018年第4期,第35页。

[3]参见《蒋中正条谕张治中拟定策动北方沦陷地区伪军反正工作具体计划书》(1945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05-111;《蒋中正令张治中呈报专管打入“匪军”与伪军内部工作人员之组织办法》(1941年5月8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70200-00010-039;《蒋中正令何应钦等研拟策动伪军工作组组织办法并保举人选》(1944年10月5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70200-00021-004。

[4]《王泽南呈国民政府为潜赴豫西收编伪军反正自新等》(1944年11月14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国防军事档案001-072470-00002-096。

[5][7]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页,第363页。

[6]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七册,抗日战争时期(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奸,伪军将来都是中央军’等。乙、陷害与我有关之伪军伪组织人员,以借刀杀人的办法向敌告密。丙、阻止伪方人员与我接头,‘共产党将来会把你们当汉奸办,现在只是耍手腕’。……我们要足够认识××党在华北伪军与伪组织上层分子中是有相当潜伏力与某些联系的”^[1]。这样,便出现了“哪个伪军中有国(民)党,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便是我工作最难打入的伪军”^[2]。面对国民党的“联伪抗日”、表面抗日实则限共反共的严重威胁,中共总结出要“提高政治警觉,足够的认识谁是我们争夺伪军的主要敌人,是国特而不是敌特,时刻防止反动思想的侵入和国特分子的混入”^[3]。在不违背统一战线总方针^[4]的前提下进行有力地“反国特”斗争,与国民党展开对伪军工作的博弈。

中共在华北争取伪军,与国民党相比,有其自身的优势,因“过去我之宣传工作,在广大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思想中已经占有一定的阵地,……我党我军之政治威信空前提高。……华北除敌寇外,主要为我党我军势力,军事实力上,政治影响上我都是优势,且伪军伪组织的许多分子都是华北人,有身家顾虑,不得不考虑战后华北的谁属问题”^[5]。国民党的排除异己政策、特务恐怖政策,加上国民党特务分子在伪军伪组织中盛气凌人、敲诈勒索等等,已引起伪军伪组织中许多人士的不满^[6]。这就为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争取伪军工作博弈开辟了路径。中共的对策是:扩大伪军与国民党国特分子的矛盾,大量揭穿国民党一贯的排除异己编并政策,嫡系吃得开,杂牌受苛待,甚至逐渐被消灭的事实。揭穿国民党曲线救国之反动性,及指出其前途之危险,说明我三大保证及团结抗战之一贯主张,指出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无能^[7]。同时,“时刻与正统观点作斗争,揭发国民党之黑暗前途,……很好的掌握利用矛盾,孤立与麻痹国特,在政治上打击国特,……可能的经过伪军打击或清洗国特”^[8]。

以 I、II 伪军大队为例,可以展现国共双方对伪军争取的博弈状况。

对于 I 大队,“国特分子发觉该大队长与我来往日益密切,遂打算向敌人检举,破坏我之工作。在此紧急情况下,我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将其国特分子除掉,用敌名义将另一国特分子调走,粉碎了国特的破坏”^[9]。这样,成功地保持了我对 I 伪军大队的掌握。

对 II 伪军大队,国民党则进行了成功浸透,动摇了中共掌握下的伪军,致使该部分化瓦解。原因是 II 大队的中上层有相当深的正统思想,但无政治背景,谁来跟谁走,升官发财思想更强。中共与 II 大队长张某建立关系后,某国特分子也开始拉拢张某等,并与张某结拜为仁兄弟,“国特××是个知识分子,有相当的社会活动能力,自从与张×接近,(张×)对我稍有冷淡,日常言行都以××为转移”^[10]。为了解除威胁,继续掌握该伪军,就必须斗跨国特××。中共采取的办法是:“①对张×等进行了有计划的反正统宣传。②经组织上,检举国特××。当时国特××以伪大乡先生名义,住在据点里,如若打据点,即易暴露关系张×等,如果继续使其存在则我之工作必受更大影响,于是决定乘其进城时,打埋伏,结果事不机密被其发觉,这时他即畏惧逃跑至济南。国特××被斗跑,张×思想已无寄托,只好又靠近我们。”^[11]随后发生了国特分子煽动的 C 中队长被杀事件,该伪军内部从此开始分化,互相不信任。其最终走上与中共决裂、投靠国民党道路的原因是:“顽军××部的南来,他们打着‘中央军’的旗

[1][4][5][6]罗瑞卿:《今年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在北局党校上课提纲》,《前线》(第33期)1943年3月15日。

[2]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

[3][10][11]《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2。

[7][8]《山东分局、军区政治部关于大股伪军工作经验的初步整理》,《战士》(大股伪军工作特刊)1945年4月。

[9]《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1。

号,故在群众和伪军中影响很大,特别是伪军认为有了真正的靠山。张×与顽军建立联系,并开了几次会,就开始与我冷淡远离。”^[1]再加上中共攻击某城失利,某城只有7个日军,5个伪军中队,由于入城部队动作不迅速,指挥犹豫不决,没能打下该城,这使得张某认为中共未和他商量就进攻×城,给他耍手腕了,并感觉我们没有力量,连七、八个鬼子的城都打不下来^[2],增加了他对中共不满意、不相信的情绪。国特分子乘机进行反共政策的煽动,并将让张某当县长的消息透漏给他。张某为升官发财,对国民党表示忠诚,率领A、D两中队向中共区队进攻,走上了投靠国民党与中共正式决裂的道路。

中共在对Ⅱ伪军大队争取掌握的工作中也有失误,那就是工作操之过急,在没有完全掌握张某等伪军上层的前提下,就开始公开地发展下层关系,这就引起中上层的忌妒和不满,并感到“受到我之威胁太大了,直接危害了他本身利益”^[3]。他们多次向中共暗示不该在其下层发展关系:“××同志经常到×队里去,以后有什么事找我说即可,别叫鬼子知道了。”这实际上是对中共产生了怀疑心理:“既然我们是朋友为甚么还瓦解我的部下呢?”^[4]B中队长也曾对张某抱怨说:“大哥,八路军的兵(指关系)我管不了,……咱的兵和八路军打成了铁筒,我是吃不开了。”^[5]伪军军官这种情绪的萌发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也增强了该伪军对中共的离心力。

伪军的上层人物多是些“诡诈阴险,有权谋之变的极端个人主义者”^[6],他们正统思想强,但升官发财的思想更强,为寻找靠山,谁来跟谁走,成为“强权角逐下的卒子”^[7]。面对国、共双方的争取,军事力量在其周围的强弱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谁能够适当的照顾与不损害其实力,他即倾向谁,谁严重的威胁到他的存在,他也可能向谁屈服。……对这些伪军必须是痛打紧拉,打的要痛拉的要紧”^[8]。这在争取Ⅱ伪军大队的过程中也有所表现:当中共部队东进,威胁A队驻防地时,该部派其部下主动与中共联系;当C队移防至顽军久盘之地时,则很容易被国民党争取。建立联系后的关系人,在心理上充满着疑惧和不信任,特别脆弱敏感,十分看重中共对他们态度的变化。在相处过程中,他们苟安心理强烈,只要能够拖延一个时期也不愿反正,但愿相安无事^[9]。某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强烈地拨动着他们的情绪,中共对这些“情绪转折点”事件处理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工作的成败。如八路军攻打由7个日军、5个伪军中队守备的某城失利,Ⅱ伪军关系即感觉“我之力量不足,说八路军是‘纸老虎这次露了真形’,远离我们,看不起我们”^[10]。被争取的伪军首领,他们对“信义”往往极其重视,一件小事处理不好会使整个关系受到影响。因此,“对伪军中所谓‘信义’应适当照顾,当然我们对汉奸没有什么信义可讲,但是为了工作之开展,我们必须从实际工作中表示我之仁至义尽”^[11]。如中共进攻某城没有事先通知Ⅱ伪军大队长张某,张某即认为中共“未和他商量,给他耍手腕”^[12]。“打拉”策略的适当运用也是中共掌伪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把打击和争取结合起来,坚决打击最坏的伪军,展示出强大的军事力量,给伪军关系以震慑,往往能使工作更进一步,反之,则要后退。“对伪军的策略,……对任何伪军的打,都是为了达到拉的目的,只要我们耐性,即使最顽固的伪军,都有争取的可能。”^[13]“我们打击了Ⅱ伪军大队周边其他伪军,没有打他,张×即感觉够朋友。××伪军受国特掌握表现最坏,未给过严重打击,D中队长则对士兵说:人家××跟八路军对立,可是八路军并没有拔人家一根毛

[1][2][3][4][5][9][10][12]《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2。

[6]《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一:三分区掌握伪军建制大队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1。

[7]刘熙明:《伪军——强权角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8][11]《山东分局、军区政治部关于大股伪军工作经验的初步整理》,《战士》(大股伪军工作特刊)1945年4月。

[13]陈毅:《敌伪军工作的意义及其任务——在盐阜区敌工会议上的报告》,新四军敌工部编《敌工通报》(第三期)1942年7月27日。

啊！”^[1]伪军中的上层，多以封建关系为纽带形成暂时的松散联合，他们没有坚定的信仰，以利益为驱动，是一支摇摆性的武装力量，在国共激烈的博弈中，一遇风吹浪打，各部伪军就会根据自身所处的状况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也必然导致伪军在战争末期呈分化的趋势。

余 论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部分民众，在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或因为生存所迫，或为追求权势，充当了侵略者的鹰犬，成为民族的罪人。但是，也应该看到，日军和伪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民族隔阂，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军毕竟还是少数。在多数伪军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其常常“隐而不昭”“不绝如缕”^[2]。中共在对伪军的争取过程中也发现：他们总是“喜‘统战’而不喜‘敌工’的”^[3]。这或多或少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的趋向。地方势力派的伪军首领，常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胡弄他（日军）而办自己的事”^[4]的态度来为日军做事的。正如战后日本方面总结战争失败教训时所说：“（伪军伪政权）领导者都是些保全自己和追求权势的中国旧的政客。根本不想真正掌握民心，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看日军脸色行事。……所谓亲日防共政权实际上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5]这真真切切地反映出日伪之间的貌合神离。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的实力不济，渐显颓势，伪军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和政治独立倾向有上升的趋势，“一般伪军都多少看穿了敌人（日军）是‘纸老虎’，……有的伪军甚至看不起敌人（日军）说：‘鬼子有些连咱的兵也不如，早知这样谁还当汉奸’”^[6]。国内外战争形势的巨变也刺激着他们去急迫地寻求自身的出路。中共适时地对他们进行争取，是给予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促使他们早日回头是岸。争取伪军，更是在敌强我弱的战争总态势下，中共所做的现实选择，敌我强弱之势由此发生转换，这减轻了根据地外部严峻的斗争形势，使中共能够渡过抗战难关，坚持抗战，使根据地更好地得到生存和发展。这与国民党封官许愿极力争取拉拢伪军，使伪军充当削共反共、与中共争抢地盘的“排头兵”，有着本质区别。

抗战时期的华北日军，一直视中共为“最强硬的敌人”^[7]。他们高度分散部署兵力，想在彻底地“剿灭”中共势力、整肃治安后，再将兵力整合集结，另作他用，妄图将华北建设成稳固的后方钱粮兵站基地^[8]。中共虽然在军事力量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仍然坚守华北，不停地攻击、袭扰日军，将日军拖入战争的泥潭，使日军自始至终也没有完成治安肃正和兵力集结的战略意图。中共用尽全力与日军争取敌占区民众，争取伪军，使日军在华北打了一场与原来“歼灭野战军”^[9]完全不同的“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没有战线的新型总体战争”^[10]。日军始终难以侦破“存在于异民族内部的高度有机体的秘密组织”^[11]。难怪日军人员在战时就有此无奈之叹：“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12]中共在“中国的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13]而编织起伪军工作关系网，成功地化敌为友、化敌为我，在敌方势力范围内部潜藏下我方的抗日力量。这样，就使得日军晕头转向、敌我难辨、茫然无措，出色的伪军工作有助于中共异常顽强坚韧地在敌后坚持抗战并一步步发展壮大。

[1]《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附件二：掌握×伪军大队的情形》（1945年6月），〔郑州〕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G0007-007-00045-002。

[2]黄道炫：《战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开封〕《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

[3][4][6]《山东分局、军区政治部关于大股伪军工作经验的初步整理》，《战士》（大股伪军工作特刊）1945年4月。

[5][8][9][10][11][12][1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1页，第120页，第470页，第467-468页，第477页，第476页，第472页。

[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瓦解敌军是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1]以敌伪军工作为代表的中共政治工作对中共能够在敌后坚持抵抗,进而打赢抗日战争无疑具有重大意义。1941年到1942年,面对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共各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陷入“敌进我退”的艰难处境。正在此时,中共积极发展“争取掌握伪军”这条隐蔽战线,以一种“暗地开花”的方式从敌军势力内部进行突破,几将日伪间本就貌合神离的联合拆散得七零八落。在日方看来,中共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2]。这种所谓的比例分法虽与中共坚持抗战的整体事实多有出入,但其所总结的“政治战”也确是中共抗战的一个特色,而对伪军工作则正是这一特色的具体体现。日本方面在战后总结中也说道:“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结于战局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3]中共在军事力量上虽处劣势,但与日军进行政治战则是中共的“拿手好戏、看家本领”。而所谓“政治战”,并非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也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并辅之以心理与政治工作的,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力量的博弈与较量。中共与日军从单一的军事对抗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方位博弈。中共扬长避短,改变了战争形式,充分体现出中共的高明,使中共由“敌进我退”到“敌进我进”,完成了攻守之势的转换。

到了全面抗战后期,中共的伪军工作更是彰显出巨大效力。由于对伪军争取掌握工作的积极施行,中共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伪军据点,根据地面积成倍扩大。据与冀鲁豫根据地情况相似的山东根据地统计,“由政治攻势、伪军工作结合军事攻势所攻克据点占整个收复据点百分之七十,如鲁南沂河区收复八十处据点我只伤亡二人,主要是两个伪军团的反正,由内应外合的政治攻势所造成的;鲁中一百二十个据点的克复,是有伪军工作作内应;冀鲁边一二分区据点的克复几乎全有内线工作的配合。其他各地几次主要战役攻势的胜利,都是有政治攻势开辟了道路,取得了伪军工作的有力配合”^[4]。冀鲁豫根据地也成为人口将近二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的敌后最大根据地^[5]。这种成绩,一度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中共对伪军争取工作的巨大作用可见一斑。“它(指中共)拥有实行瓦解敌人的艺术,拥有深入敌人后方和在敌军内部进行广大政治工作的技能……”^[6](曼奴意尔斯基语)1944年1月陈毅在去延安的途中经过冀鲁豫,曾写下诗篇盛赞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强马壮和伪军工作的出色:“昼趲行,夜趲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7]这种“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的背后,包含了多少敌工人员“深入敌后、以身相押的勇毅”和“难以为外人道的惊心动魄”^[8]。

[责任编辑:道成]

[1]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二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2][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2页,第468页。

[4]《山东分局、军区政治部关于大股伪军工作经验的初步整理》,《战士》(大股伪军工作特刊)1945年4月。

[5]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页。

[6]刘型:《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1939年10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10期。

[7]陈毅:《长相思·冀鲁豫道中》(1944年1月),曲仲、王义印编《冀鲁豫边区文艺资料选编》(五),〔郑州〕河南省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1990年版,第354页。

[8]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